



金融研究简报

第二十七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4年5月9日

大宗商品定价权与中国金融改革

大宗商品，是指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也逐步攀升，因此，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上几无发言权，与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极为不符，即便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宗商品贸易领域，如稀土、原煤、天然橡胶等，中国同样是陷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利局面。这种不合理的境遇严重影响着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2014年5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了题为“《大宗商品定价权与中国金融改革》主题研讨会”，邀请了来自金融界和研究机构的数名学者，就中国与大宗商品的关系、大宗商品定价权对中国的意义进行了讨论，并详细描述了中国如何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金融体制改革：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汤珂（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一、中国与大宗商品

1、大宗商品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和进口国，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铁矿石的消费占到世界铁矿石消费量的66%，中国的铜占到46%，小麦占到18%，大豆占到一半左右，而对于铅的消费量，或者需求量来说，整个世界除了中国来说基本是一个平稳的态势，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有所下滑，之后又上升。但中国对铅的需求量上升很快。对于锌的需求，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也基本上是相对平衡的，但中国对于锌的消费量从2002-2013年却是很快的增长。

有数据显示，从2009-2011年，中国工业用的大宗商品，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建设步伐的增快，使用量翻一番。因此，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国家，或者说这样一个以工业制造见长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

2、中国未来增加大宗商品的需求量的因素

第一，城镇化。自从新的领导班子上台以后，城镇化是非常鲜明的发展方向。城镇化从现在的52%提高到2020年60%，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

城镇化对于原材料的需求非常大，特别是对于钢铁，以及对铜和其他工业金属的需求。

第二，中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中产阶级消费模式改变使我们的消费格局也发生变化。一是我们要穿衣服，对于棉花的需求，还要吃好的，对于白糖等副产品的需求的增长速度很快。二是对能源的需求，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车，有的家庭甚至有两辆车，这么多的车对于石油的需求或者有些车烧天然气的，对于天然气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能源的需求。

更重要的一点是饮食结构的变化，之前我们谈粮食安全主要谈的是小麦还有大米之类的粗粮，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肉类和蛋白质的需求很高，而对肉类和蛋白质的需求就带来了饲料的需求。饲料主要是豆粕和玉米，豆粕来源于大豆，因此，我国对于大豆和玉米的需求将来会变得很大，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大豆 95% 都是进口的，特别是榨油的大豆、给饲料用的都是进口的。这些材料一旦价格出现波动或者国际贸易出现问题，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打击。

二、什么是大宗商品定价权

在国际贸易中，商品价格通常是按照期货价格来定价的，所以，期货价格被人们逐渐认为是一个定价基准。大宗商品定价权是制定大宗商品价格发现规则的权利，期货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发现的市场，制定期货市场或者其他市场规则的规则制定者就拥有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果大宗商品价格能够反映合理的需求，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大宗商品价格，这样就不存在定价权问题，因为金融市场价格本身反映了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这样对定价权的争取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但从 2004 年以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并没有真正反映供给需求或者它没有反映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所以，争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是有意义的。

1、欧美或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缺失

(1) 在欧美市场之外有一个庞大的 OTC 市场，也就是说在期货市场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是不透明的，它是一种大家在柜台上交易的市场，它占到交易量的 80%，而且这个市场基本没有监管，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定一些协议和合同。这个市场发生了一些暗箱操作的价格往往影响到了期货市场价格，所以场外 OTC 市场往往是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影响非常大的市场。

(2) 期货市场的投机。期货市场的投机会带来期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上涨和下跌，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还有一些大的期货交易公司，他们在期货市场上的投机使得期货价格偏离实体经济应该具有的价格。投机还导致过度交易。我们发现期货市场的交易额非常大，远超过对于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所能指导的交易量。

(3) 从 2002 年以来，大宗商品出现了一个新的属性，即投资属性。从 2000 年以后，这些机构投资者还有中小投资者逐渐把大宗商品作为一种投资性产品。原来大宗商品由于供给和需求买卖和互相交易的平台，通过期货来交易，而从 2000 年以后大家把大宗商品逐渐认为是一种投资工具，这个投资属性把大宗商品变得出现了更多的金融属性，这就是大宗商品的金融化。

(4) 融资属性。投资者通过进口铜，把铜进口到中国，之后再吧铜作为抵押品向银行贷款，这是一种融资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资本或者获得信用，把钱借到以后投资中国的房地产，这个融资属性当然也使得大宗商品的价格偏离了实际的供给和需求。

总体这四个机制都使得大宗商品的价格偏离了它的供给和需求所应有的价格。总而言之是因为大宗商品都是通过期货市场交易。

2、大宗商品定价权命题的合理性

第一，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命题不是一个伪命题。目前期货市场的定价

机制不完全反映供给与需求的价格，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反映，但由于很多因素被扭曲了，上述的 4 个因素在扭曲这些价格。

第二，投资和投机因素扭曲了均衡价格，实际价格也被扭曲了。特别是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信息的不透明，助长了这些投机行为。市场信息不透明首先表现在大宗商品的交易价格同商品的存量相关，而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存量根本无从统计；其次，OTC 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也没有具体统计；最后，并不是所有的交易所都公布大户持仓。这些信息不透明实际上都助长了投机行为。

三、大宗商品定价权的重要性

1、粮食安全。一是关于大豆，有 4 家公司，ABCD 依靠大豆市场的高波动控制了中国整个大豆压榨的产业。二是玉米和燃料乙醇，世界能源价格变高了以后，玉米可以生产燃料乙醇，玉米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大豆？我们国家要注意玉米不要重蹈大豆的覆辙。

2、工业经济安全。我国成品油的价格是根据国外三个期货市场的价格制定的，这些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油价，我国现在还在使用那个价格，但应该意识到国外期货市场的油价受到很多金融因素和投资因素的影响。当然还有铁矿石的价格。

3、输入性通胀。我国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带来了输入性的通胀，这些通胀实际上最终导致制造型企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输入性通胀的结果。

中国不是定价中心或者没有定价权，它没有一个信息的交换，我们对于华尔街发生了什么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贸易商们因为不了解，而最终导致了巨额的亏损。所以，包括中国大妈投资黄金和华尔街的 PK 中，显然由于对黄金流入流出的信息不了解，短期内一定会输掉，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外汇是一个固定外汇制，使得中国的投资者会考虑

到通货膨胀的原因。解决输入性通胀最好的办法是买大宗商品，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和通胀的价格相似度很高。中国投资者也会买大宗商品，大宗商品价格也会高。同时由于中国的购买和投机者购买大宗商品价格变高以后，很多世界上的大宗商品生产企业就会大量的生产大宗商品来建立非常多的矿藏，来开矿，就像之前的铜一样开了很多矿。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一个强势的中国增长，这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量非常大，这样它也会购买国际上的大宗商品，致使大宗商品出现很大的泡沫。

2008年以后，首先是政策制定者害怕高通胀，这样它就会收紧货币政策，收紧货币政策就会导致投机者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投机了，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下跌，同时，比较紧的货币政策也会降低发达国家对于工业品的一些需求，降低它的经济发展速度，这样的话也会降低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使得实体制造者离开或者是实体大宗商品需求者变少，投机者离开，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又会下跌。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由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量变少，之前过度开采或者过度的产能要释放掉，这也会使得大宗商品见底，以很低的价格来卖。这就是现在的铜价，大家要分析铜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以前铜价太高了，非常多的铜矿的开采，导致非常多的铜矿在生产。现在大家看铜矿的需求量和铜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了，中国经济变冷以后，大量的铜销售不出去，所以铜的价格一跌再跌。

另外是中国输入性通胀和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我们看到整个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和变化被原封不动或者是很强的传导到中国的原材料进口中，我们原材料进口的价格绝对是和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高度相关。但我们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却和大宗商品价格不相关，这是因为制造型企业吸收了很大的损失，制造型企业由于竞争的关系要维持它的产成品价格的稳定性。比如做铜电线的，铜价再涨电线的价格也不会涨太多，铜价再跌我的价格也不会跌太多，所以，铜价上涨下跌被制造企业所吸收了。因此，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制造型企业的伤害很大，因为它用公司的利润来承担

了这种价格的波动，这实际上是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的一些变化对于中国的传导。

关于大宗商品过度波动的观点，在 2011 年 G20 会议上被提出了。大宗商品的过度波动，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产生影响，当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更大了。所以，当时 G20 呼吁世界范围团结起来，要治理大宗商品市场特别要治理美国的期货交易市场。但当时美国这个国家是以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自由金融市场为标志的国家，他们不太会企图治理他们的交易所。

四、中国获得定价权的步骤

1、中国应该利用 G20 的平台，呼吁大家来管理欧美大宗商品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以中国现在的国力、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现在的世界环境是能够做到的。

2、中国应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完善中国的期货市场。因为中国的期货价格，包括我自己的铜和大豆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期货市场的变化在影响国际价格，特别是铜和大豆的价格在逐年变强，中国的价格反映了中国的大豆和铜的供给和需求，这些因素会传递到国际市场，这两个期货是比较成熟的市场。

3、要适时推出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商品期货。因为美元还是一个国际性的货币，这样的话你要有定价权，应该是以美元为单位的商品期货，大家使用美元非常方便投资和结算。要是换成人民币，得到人民币以后很难来投资，比如说中国没有很好的资本市场，中国期货买卖要吸引一些投机者进入，一些投机者进入以后用人民币来交换的话，投机者赚来人民币，而它很难用人民币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挣到钱这就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要适时推出美元计价单位的商品期货。在推出的过程中，应该利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天然优势，因为中国是大

大宗商品最大的进口国，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利用大宗商品最大的进口国来使我们获得定价权。推出以 ... 以后，我们就会说我们按照上海石油交易价格来决定我们的国际贸易价格，我不按布伦特原油或者是 WTI 原油价格，不按迪拜的，这样就是我们利用自己的贸易天然优势。

4、争取定价权商品的先后之分。我们应该争取什么样的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首先要争取地域性和垄断性的。地域性是指天然气，天然气在欧洲、美国和中国市场是分割的，地域性使得欧美市场很难干涉到中国，对于有地域性的我们要争取设立自己的定价权。垄断性的，比如说铁矿石，我们全是进口，稀土全是中国出口，包括这一系列的大宗商品我们很容易实现有定价权，因为在这个市场上有一半的买方是中国的，这样我们应该争取这些定价权。我们要有期货交易所，要出台这个交易所规则使得世界交易所的价格发现规则能够更公允，能够让世界上的合作伙伴认可这个价格发现规则，使用我们的定价权。二是战略性和高进口的大宗商品为第二步，战略性是石油，这个已经在推出，上海已经在筹建了。另外进口量比较多的像铜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帮助，这类要适当的考虑推出定价权。三是全面铺开，所有的大宗商品我们都要争取定价权。

中国首先要呼吁 G20 的国际社会对大宗商品市场进行监管，不能任由高投机和其他因素把大宗商品价格搞得忽高忽低，这对于实体经济，包括对 G20 很多其他国家都有影响。另外要提高市场的透明度，要设立每种期货交易的最高头寸，逐步使场外交易场内化，使信息透明化。

其次是监管主权基金，目前设立主权基金的国家都是大宗商品主要生产国，比如说挪威是生产石油的，北海油田的石油。挪威生产了石油以后，用得到的钱设立了主权基金，通过主权基金来投资大宗商品和石油，其他国家买了石油以后油价又变高了，变高以后挪威生产的石油又能卖更多的钱，并拿了这个钱再投资石油，这样一个正向循环，使得大宗商品价格逐渐升高。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中国是最不应该投资大宗商品市场的，因为越投资价格越高，受到的损害就越大，而中国现在正在投。

所以，要监管 50% 以上的主权基金。

再次是监管投资银行，现在进入大宗商品的投资银行越来越少了，因为巴塞尔协议三把进入大宗商品的交易加了一些严格的规定，所以他们现在越来越少，但相对而言期货生产和交易公司在大宗商品市场上还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对他们的监管也很重要。

另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上要试图绕开期货市场，回避金融因素，比如我们直接购买矿山。还有在非洲石油换基础设施的策略很好，我们用石油换基础设施，我们给你建基础设施你把石油给我们，这样避开了期货的定价，因为期货的定价一是不准确，二是波动性太大。我们还要购买期货交易所，拥有了期货交易所以后就可以视同有了定价权，当然目前也不是很容易制定交易规则，因为要是制定了不好的交易规则交易者会离开，所以怎样制定符合当地情况和中国利益的交易规则很重要。

最后一个很重要是贸易安全。包括粮食安全，之前我国提的粮食安全都是粮食产量增加，让老百姓有饭吃，但现在这个观点可能要改变，粮食安全要变成贸易安全，因为我国老百姓的食品结构已经从粮食转成肉食，我们国家对大豆和玉米都是超强的进口国了，那么贸易安全对中国很重要，而不简单是有口饭吃就行了。粮食安全中，50% 应该包括贸易安全。所以，要注重贸易安全，在签订贸易条款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注意会不会在战时和其他时候出现问题。

五、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

1、期货市场的改革。中国发展好自己的期货市场对于定价权很有帮助，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期货价格实际上对国际价格发现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第二，当人民币逐渐国际化以后，在中国交易的期货价格很可能是一个定价机构，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来说。另外在中国的期货市场上要尽量多引入机构和法人投资者，中国的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都是一样，机构投资者太少了，机构投资者对价格发现起到很大的作用。期货

市场一定要以增加流动性为先导，现在中国期货市场上散户太多流动性偏小，只有流动性增加了以后发现的价格才会被认为是真正好的价格，增加流动性是建立期货市场一个重要的目标。可以考虑引入做市商制。

2、上海自贸区改革。因为自贸区没有进关，它等于为美元期货提供了机会，等于是没有入境。现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已经在自贸区设立了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推出了石油期货的开发，但对于石油期货以人民币定价和美元定价是有争论的，但一定要以美元定价，否则就没有意义在自贸区推出。当然中国企业也提供了套期保值的场所。自贸区还应该尽快推出的就是液化天然气的交易，因为现在上海已经有这样的潜力，首先上海已经有对接天然气管道的功能，四川的天然气包括从北边运输的俄罗斯的天然气第一步送到上海，北边送到大连，还有中缅天然气管道，这都是很好的天然气管道。同时上海有自贸区，应该在自贸区设立天然气的交易中心，效仿石油。如果上海推出这个以美元计价单位的期货商品，就容易获得亚洲地区的天然气的定价权。

3、定价权和我国的战略核心问题。

一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与能源、经济的安全极为相关，特别是城镇化的背景下，未来20年50-70%的城镇化的时候，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会大量增长，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和定价权，对我国的能源和经济安全很重要。

二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粮食安全关系紧密。由于我国人口消费习惯逐渐从粮食转化为肉类，对于大豆玉米还有其他粮食的贸易安全是变成了粮食安全的一个核心，九连增和继续保持粮食丰收是一个观点，但贸易安全是另外一个支柱。当然粮价的定价权是以粮食安全为核心。

三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与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前，我们应该尽量在自贸区推出以美元交易的期货，因为中国的资本帐户没有开放，中国的资本流入流出是受限制的，为了推出自由市场上的这种交易，推出美元期货，让美元自由流进流出，而且上海是一个港口，交割完以后石油可以随时运到世界各地，也可以运到中国。资本帐户开放以后，我们

可以考虑推出人民币期货，当然开放以后也不是马上，也要等到人民币有一定的国际化程度以后推出以人民币为标记的期货，能够帮助人民币开放，因为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如果我们以人民币为计价标准定价国际贸易一定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到那个时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大宗商品是否金融化

许元荣（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大宗商品出现了一个新的属性，即投资属性，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大宗商品看作是一种投资工具。

第一，关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这个概念我非常认同，全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规模已经比现货市场规模大太多了，像 WTI 布伦特原油大概在 20 倍左右，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一般在现货市场的规模 10 倍左右，30 倍左右的也很常见，甚至更高的都有。就是在量上，期货市场金融工具已经胜出很多。

第二，大宗商品金融化或者大宗商品异化的概念，使现货市场成为期货市场的影子，期货市场价格决定现货市场价格。期货市场的资金、对冲资金、投行资金流入期货市场，推高期货市场，再带动现货市场上涨，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现在像中粮集团、国投集团每一宗现货交易必须允许期货交易看一下，否则不容许做，这是风险敞口不允许。

第三，我们观察全球商品市场的价格，发现中国对外依存度最高的那些商品价格往往被推得最高最离谱，像中国能自给自足的铝、锌等价格常年很便宜。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这些定价体系中有很现实的吃亏现象。

第四，定价权中的中国角色分量在上升。我认为定价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国的金融机构、金融主体的能量增强。因为价格是被金融机构交易出来的，被华尔街交易出来的，所以现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成长反映在一些品种上，话语权开始很大。比如在两年前有一个新闻说中国某家私募基金对美国的棉花持仓超过了 25%，操纵了美国的期货市场，所以给它

开了很大的罚金。虽然这是不好的新闻，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中国金融机构交易能力的上升已经可以影响到国际上一些大宗商品的定价。

第五，从大宗商品金融化角度进一步延伸，现在整个世界经济都在朝着金融化的方向前进，随着金融资产与 GDP 比重的上升，经济自身传统的这种康氏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在逐渐消退，而金融市场的周期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一个新的现象。换句话说，货币政策主导金融周期，金融周期决定经济周期，这成为一个新的周期。

于小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大宗商品定价权是一个规则制定权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决定价格。我们以前受到很大的损失。金融化在定价权上不断的加强，这是很大的一个趋势，它的持仓量和交易量在上升。

在 2012 年以后或者说从 2010 年有一些趋势来讲，美国股指相关度有很大的变化，从负相关直接到正相关，而且不光是它，包括它的十年的国债，正相关转成负相关再转成正相关，现在国债收益率和美指现在已经同步了，这个事情感觉上，从大宗商品的持货量来讲，尤其从法案出台虽然执行的不是特别严格，但大量的机构投资已经相对规范多。相对美国的战略投资中心从大宗期货在退下来，感觉有收缩的过程。在这种收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我们很难取得话语权的方面跟随美元计价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建立一个以人民币计价，包括大商所直接以现货交割就可以了。最后，要跟金融市场、实体资源的企业挂钩，否则金融部门做金融部门的，产业部门做产业部门的，像收购伦铜，它收购完以后实际上参与到国际大宗商品炒作中，对国内实体经济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花这么多钱收购它。

罗思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我非常支持托宾税，但我觉得托宾税是针对短期汇率变动而不是针对期货变动，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不太同意通货膨胀或 CPI 的

变动和期货消费者价格指数关联性不是非常强这一观点，因为这个图表是说明CPI的变动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而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的关联性更强一些。

还有我觉得在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影响到全球期货市场价格的定价权。我的想法是中国会长期保持经济的增长，但在这方面中国不会影响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定价权。金融市场在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起到了这么大的影响是个结构性的原因，因为大宗商品必须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适应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或者期货价格的变动。在农产品大概需要一个丰收的季节才能适应价格的变动，而贵金属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两个市场之间有一个区别，他们清算的周期是非常不同的。而在金融市场，它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几秒钟清算出所有的交易，但期货市场需要大概十年的时间才能清算所有的交易，所以你必须要有有一个机制来协调不同市场清算周期的不同，而这就是金融市场。

所以，你不可能去金融化，这些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因为这些市场影响太大了。所以，这些市场会集中在最大的经济体，因为他们不是有大宗商品本身主导，而是金融的功能才是主导因素。因此，它会长期集中在美国和伦敦等其他的发达经济体。

短期投机行为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托宾税可以解决这些短期投机行为，但在期货市场上，我觉得短期行为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托宾税不能起到作用。

刘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我还是比较赞同汤老师的意见，对罗老师的意见谨敢苟同，理由是我认为大宗商品的价格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基本面的因素即供求，另外一个金融因素，基本面的供求是不太变化的，而我们最近的价格陡增，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繁荣引起的所谓金融危机，全球都在去杠杆化，包括美国、欧洲碰到的债务危机也是高杠杆化引起的问题，包括国外对我

们的紧张程度，担心我们的紧张程度也是一个杠杆化的问题。而且 2013 年看到黄金价格全球降了 30%，CBOT 玉米价格降 39.9%，小麦、豆油都下降 20% 以上，还有其他价格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很厉害。巴三协议，要求美国的大型银行不允许去投资大宗商品，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是 market 2 market，就是它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很厉害，银行体系一定要和大宗商品价格分裂开。美国的银行宣布撤出欧洲的电力和天然气的市场，摩根士丹利也是出售了石油的储备，包括高盛也在找石油的买家，还有摩根大通也在剥离大宗商品的仓储，所以我认为它的金融属性还是比较关键的。

我之所以同意汤老师的意见，是因为我们是处在一种大宗商品没有建起来，刚刚萌芽的过程中，而欧美实在是投资过剩，出现了金融危机，而我们正好应该是大力发展的。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21 世纪以后，整个全球人类的发展三大速度变快了，一个是全球化速度变快，一个是信息化速度变快，三是金融化速度变快，在这个大背景下整体上大宗商品所造成的定价权发生了一种巨大的飘移和巨大的浮动，这样增加了定价权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博弈国际国内压力越来越大，刚才有老师和听众都提到了这种看法。第二，我认为也是中国的机会，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金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